

《五代史平话》为金人所作考

宁希元

清末，吴县曹元忠于杭州得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一种，武进董氏诵芬室据以影刊，遂显于世。此书，元明以来公私书目皆未著录，实为话本小说中之惊人秘籍。曹元忠断为宋刊，跋曰：“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，而书贾刻之，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‘新编五代某史平话’也。惟刊自坊肆，每于宋讳不能尽避，……要亦当时习惯使然。”由于未能尽避宋讳，宋本之说不大为人们所接受。比较通行的看法是：宋人旧本而为元人所增益者，就是说，今见《五代史平话》当为元刊本，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。

古书版本的鉴别，是一项比较专门的学问，牵涉问题很多，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性的考虑，单从版式、避讳上，是很难论定的。何况曹氏所说的《五代史平话》原本，已不可得见。这样，现在所见的影刊本，是否忠实于原书，也就无法进行比勘。至于避讳，诚如曹氏所说，历代民间刊本，于此多不大讲求，故亦不可据此一点，判定其写刻年代。但是，《五代史平话》一书，究竟成于何年？行于何地？它所反映的是某个时期的“讲史”风貌？以及它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何意义？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讨论的。

“讲史”，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。最早，唐人俗讲中，就出现过《伍子胥变文》、《李陵变文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、《韩擒虎话本》等讲述古人古事的小说，不过所讲多为民间野史，和历史出入较大，只可以看作是它的萌芽。正格的“讲史”，即讲说史书，讲说一个朝代的兴亡，是两宋的事情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

录》卷五“京瓦伎艺条”，记崇宁、大观间（1102—1110）东京开封府说话艺人中，已经出现了霍四究、尹常卖这样的“讲史”专家，分别以说《三分》和《五代史》而名闻都下，可见那时的“讲史”已有相当的水平。进入南宋以后，“讲史”更和“小说”分庭抗礼，成为说话中最有势力的两家。讲史名家，更如雨后春笋，纷纷而出，仅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诸色伎艺人条”所记，就有乔万卷、许贡士、张解元、陈进士、林宣教、武书生二十三人之多。以“万卷”为号，自然是取杜诗“读书破万卷”的意思。至于“贡士”、“解元”、“进士”、“宣教”诸名，都是当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美称。讲史家以此标榜，同样是以含经咀史、记问渊源来动人听闻的，所谓“破尽诗书泣鬼神”是也。

和讲史家所好者不同，当日小说家的名号就没有这股书卷气。试看《武林旧事》同卷所记三十九位小说家，名字都很本色。甚至如“故衣毛二”、“枣儿徐荣”、“爇肝朱”、“粥张二”、“酒李一郎”等，还特意标明其原本出身不是儒林，而是地地道道的市井小民。盖小说家虽然同样也要博览多闻，“幼习《太平广记》，长攻历代史书”，但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“破尽诗书”，而在于即景生情，编撰离奇动人的故事以吸引听众，即善于“捏合”和“提破”。比起讲史家之依墙傍壁，敷衍史书，显然富有更多的创造性。他们的艺术成就，自然也要略高一些。

两宋讲史的繁荣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，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兴起，无疑是起了关键作用的。他们讲说《通鉴》，讲说历代书史文传，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残唐五代。甚至如王六大夫者，于咸淳年间（1265—1274），还为度宗讲说过《复华篇》和《中兴名将传》，则更是南渡以后的新事。单从普及历史知识，总结历史经验来说，两宋讲史家的功绩，也是不可磨灭的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这一时期的讲史，由于过分地依附史书，在叙述

历史事变、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，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更多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。原始史书的种种缺陷，包括思想的和艺术的，自会反映到讲史平话中来。特别是早期的讲史平话，如《五代史平话》，表现得就更为突出。

《五代史平话》，旧说出自“南渡小说家”之手，或者说是宋人旧本而为元人所增益者，这可能是一种误会。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几种有关说话资料的著作，如《都城纪胜》、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、《梦粱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等，都是宋人或宋之遗民所作，所叙都是杭州一个地区的事情，因而人们很容易把现存的几种早期平话，都和宋人或杭州联系起来，这是不太科学的。最近，笔者根据几种有关史书，将《五代史平话》点勘一过，发现此书实为金人所作，其成书年代，当在金亡前后。

要证明《五代史平话》为金人所作，必须从它的题材来源，即由史书和话本小说谈起。

先说史书。讲史，“讲说前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”，自不能拒绝有关史书的引用。特别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由于按年叙事，上起周秦，下至五代，前后一千三百余年，无形中为讲史家组织史料，敷演一朝兴亡，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，更为平话艺人所看重。直到入明以后，《通鉴》一书仍为讲史家所称引。今见明刊早期讲史演义各书，如《开辟衍绎通俗志传》等，仍以“按鉴演义”、“按鉴编纂”的口号相标榜，可见其影响。

《五代史平话》的编纂，也是这样。书中所叙历史大事，都由《通鉴》五代部分剪辑而成，有些地方虽易为口语，但更多的却是原文的直录或节抄。总计全书十之八、九的篇幅，都由《通鉴》而出，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高明的《通鉴》（五代部分）的缩编本。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引子》说到当日讲史家之演说史书，是“得其兴废，谨按史书；夸此功名，总依故事。”《五代史平话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们可以

用《资治通鉴》；来改正、校补今本《五代史平话》的若干错误。如《晋史平话》卷下叙契丹入大梁，宣桑维翰一段：

维翰知不〔免，顾谓崧曰：“侍中当国，今日国亡〕，
□□反令维翰就死，何邪？”〔崧有愧色。彦泽踞坐见维翰，维翰责之。〕□□曰：“今日事已至此，公有何〔言”？
维翰责之曰：“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，〕复领大镇，授以兵权，何为负恩至此？”

文中加〔 〕号内各字原缺，都是根据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六》校补的。

除《资治通鉴》外，欧阳修酌《新五代史》，是《五代史平话》的作者间或采用的史书，以补充《通鉴》叙事之不足，但仍是整段整段地节录。如《唐史平话》开首“论沙陀本末”，就节自《新五代史·庄宗本纪》。全书类此之例不止一处，读者可以复按。这里，引起我们注意的，是《平话》的作者，没有直接引用过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，尽管书中有不少段落确为薛史原文，但仔细考察，这些文字都没有超越《资治通鉴》引用的范围。我们知道，从叙事的详赡上，史料的丰富上，《旧五代史》显然都胜过《新五代史》。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胡三省为之作注，之所以专据薛史，不取欧史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敷演五代兴亡，《旧五代史》更应该多所取资，而今日的讲史家们竟然屏而不取，岂非数典忘祖！最合理的解释，是《平话》的作者，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薛史。由此，我们想起一重公案，即金章宗泰和七年（1207），曾明令“削去薛居正《五代史》，止用欧阳修所撰。”自此以后，薛史不行于中原，不为一般人所知，但当时的南宋地区，仍是新旧两史并用的，沈括、洪迈诸人著述，兼采新、旧二史，即为明证。《五代史平话》没有直接采用薛史，只能说明，它确是金人所作，而不可能出自“南渡小说家”之手。

再说话本。讲史、小说，虽各有体，但在互相竞争之中，又互有影响，互有渗透。而话本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故事，对讲史的影响尤为明显。如《三国志平话》卷首之“司马断狱”故事，即取自话本小说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》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三十），《前汉书平话》卷中之“张良辞汉”，袭取话本小说《张子房慕道记》（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）的痕迹也是至为清楚的。《五代史平话》中，叙朱温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等人的出身故事，纯用口语，描写亦多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，与平话中节略史书部分，风格迥异，亦自当取之于当日的话本小说。小说家虽然也讲历史故事，但和讲史家不同，他们不迷信于史传，所讲多为民间野史，即由历史上的一点事迹生发，驰骋想象，编撰有趣的故事。比如《史弘肇龙虎君臣会》（《古今小说》卷十五），叙史弘肇、郭威两人由无赖泼皮而发迹变态，即纯为民间传说。说话人于小说收场时郑重交代：“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，若按欧阳文忠公所编的《五代史》正传上，载道梁末调兵七户出一兵”云云。可见，欧阳修的《五代史》他们是读过的，但所讲的仍是不见史传的野史。这里只提到欧史而不及薛史，可能这篇话本也是金代后期的作品。

正是由于话本小说中的历史故事，不拘泥于史书，这样就为说话人的临场发挥，提供了自由想象的天地。小说家在演述这类故事的时候，往往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，加以提炼概括，讲得栩栩如生，如在眼前，较之讲史平话，话本小说显然富有更多的现实色彩。在考定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上，应该估计到这样的因素。我们说《五代史平话》为金人所作，同样可以从它所引用的话本小说中找到有力的旁证。比如，《周史平话》中叙郭威“乃山东路邢州唐山县地名尧山人氏”。请注意，只有金人，才有这样的说法。“山东路”的前身为北宋的“京东路”，包括首都开封以东、黄河以南地区，后分东、西两路。直到金初天会年

间（1123—1137），金人奄有中原以后，以其首都在上京，才改“京东路”为“山东路”，仍分东、西两路。至于“邢州”，晚唐五代，皆属昭义节度；北宋时升为“信德府”，属河北东路。入金后复为“邢州”，始属山东西路。而“唐山县”，本名“尧山县”，亦金时所改。再如《汉史平话》中，叙刘知远欲往“太原路”投军，这个地名的出现，年代更晚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：太祖十三年（1218），始立太原路总管府。在此以前，自唐至宋、金，皆为太原府。元太祖十三年，为金宣宗兴定二年，下距蒙古灭金（太宗六年、1234），还有十六年；灭宋（世祖至元十六年、1279），更有六十一年之久。《五代史平话》就产生在金亡前后这个动乱的年代里。

《五代史平话》成书于金亡前后，这个结论，还可以从它所采用的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的版本上，加以论证。

现在我们常见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为元初胡三省的本。据胡氏自序，此书之作，始于宝祐四年（1256），中更丧乱，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始成定本，前后约三十年。这个本本的刊刻，当更在后。用《五代史平话》所引《通鉴》各节，与胡注本比勘，多有出入；而这些出入，又多暗合于宋本。可见平话作者所使用的《通鉴》，实为宋本，而胡三省注本不及见焉。近人章钰，曾以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，校勘宋刊《通鉴》九种。其间，“十二行本”与“乙十一行本”，皆存五代部分。今取章氏所校与《五代史平话》所引，其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卷二百五十二《唐纪》六十八：“蕲州刺史裴偓，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偓’作‘渥’，下同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梁史卷上作“刺史裴渥”，与二本合。

（二）卷二百五十三《唐纪》六十九：“六月，宰相请除巢府率，从之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府’上有‘率’字；乙十一行

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梁史上作“请除黄巢率府”，“府”下脱一“率”字。

(三) 卷二百六十《唐纪》七十六：“朱瑄遣其将贺瓌、柳存及河东将薛怀宝，将兵万余人袭曹州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薛’作‘何’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梁史上作“何怀宝”，与二本合。

(四) 卷二百七十一《后梁纪》六：“（张承业）即归晋王邑，成疾，不复起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王’作‘阳’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又：“十二行本重‘邑’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唐史上作“即日归太原，邑邑成疾。”

(五) 卷二百七十二《后唐纪》一：“可求笑曰：‘吾卑辞厚礼，保境安民，以待之耳。’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卑’上有‘但当’二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唐史下正作“但当卑辞厚礼”云云，与二本合。

(六) 卷二百七十三《后唐纪》二：“诚惠安坐不起，群臣莫敢不拜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拜’下有‘独郭崇韬不拜’六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唐史下有“惟郭崇韬不拜”六字，由二本出。

(七) 卷二百八十《后晋纪》一：“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丹’下有‘主’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晋史上作“契丹主”，与二本合。

(八) 卷二百八十五《后晋纪》六：“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。”章校：“‘都指挥使’，十二行本作‘招讨使’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晋史下作“都招讨使”，可补二本之

失。

(九) 卷二百九十一《后周纪》二：“民有诉讼，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，不直，乃听讼于台省。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讼’作‘诣’，无‘于’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上作“乃听诣台省”，与二本合。

(十) 卷二百九十三《后周纪》四：“唐诸将请据险以邀周师，宋齐丘曰：‘如此，则怨益深。’”章校：“十二行本‘深’下有‘不如纵之以德于敌，则兵易解’十三字；乙十一行本同。”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下作“不如纵之，使敌人怀德，则兵易解也。”由二本出。

总计全书类此之例，凡二十有七，兹从略。

章氏所说的“十二行本”，现存一百七十六卷，避讳至“构”字止，为绍兴二年（1132）浙东茶盐公使庠刊本，年代较早。章氏所说的“乙十一行本”，首尾俱全，为涵芬楼影印之宋本。此书版匡字样，与章氏所见之第六种宋本，即“甲十一行本”相似。“甲十一行本”中，“郭”、“敦”诸字皆缺笔，当为宁宗（1195—1224）以后刊本。而“乙十一行本”复对“甲十一行本”中的错误，多所匡正，显为两刻，则其刊行年代当更加在后，估计当在理宗（1225—1264）、度宗（1265—1274）之间。

以上诸例，都有力地说明，《五代史平话》所采用之《资治通鉴》，实为宋本。问题是作者所见，究为何种宋本？是南宋初年的“十二行本”？还是宋末的“乙十一行本”？尚难确指。因为，现在所见之二十七例，除个别出入外，基本上同时见于两本，文字相同，无法作出判断。比如，卷二百九十一《后周纪》二：“丁未，谷以病臂久未愈，三表辞位。”胡三省注：“‘谷’上须有‘李’字，文乃明。”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上与“十二行本”同，“谷”上正有“李”字，似可说明《平话》所用者为

“十二行本”。但是，卷二百九十三《后周纪》四：“终不负永陵一培土。”胡三省注：“欧史作‘一抔土’。”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下与“乙十一行本”同，均作“一抔土”。又，卷二百九十四《后周纪》五：“愿得海陵监南属以贍军。”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下与“乙十一行本”，都作“海陵盐监”。后面这两条，似又说明《平话》所用者为“乙十一行本”。但也有可能，作者所用者为今日失传之另一宋本。这个问题，一时不易解决，姑且存而不论。好的一点是，作者所用《通鉴》，已仅有见于“乙十一行本”之文字，结合书中所出现的“山东路”、“太原路”等地名的确切年代，《五代史平话》为金人所作，成书于金亡前后的论断，还是可以成立的。

从北宋末年尹常卖在东京开封府说《五代史》，到金亡前后《五代史平话》的刊行，一百五十年中，虽屡经动乱，中原地区的说话，始终在不断地发展着。北宋灭亡以后，原先活动在东京的说活人，固然有一部分人随赵宋政权南下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艺人，依然留居北方。这样，在南北两个王朝的长期对立中，逐渐形成杭州、燕京（后期又转向开封）这样的民间文化中心。以诸宫调而论，我们今天所见的几种，如《董解元西厢记》、《刘知远》（残本）、《天宝遗事》（有佚曲）等，都是北方的作品。以说话而论，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金熙宗时，说话人刘敏讲说《五代史》；《金史》卷一百二十九记金海陵时，有张仲軻“说传奇小说，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”；又，卷一百零四记金宣宗时，有“贾耐儿者，本歧路小说人，俚语诙谐以取衣食”。元初，周密《志雅堂杂抄》卷一自云，于友人处借到“北本小说”《四和香》等数种。这些材料，都足以说明与南宋王朝相对立的金代，说话艺术的繁荣景象。以往，文学史家论话本时，只讲“宋元话本”，忘记了金代，这是不够确切的。我深信，现在学术界所公认的所谓宋元小说中，必有相当的金人作品在，《五代

史平话》就是一个例子。另外，《前汉书平话》中，叙蒯通为“燕京东柳管村人氏”。燕京即今北京，古幽州地，五代石晋时入辽，始号燕京，金仍之，海陵贞元元年改称中都。这本平话虽刊于元至治间，其产生年代很可能也在金代，因为宋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称呼的。自宋、金联盟破辽，金人以燕京归宋，改燕山府，前后不及三年，又为金人所得。时间虽短，宋代公私文书中，仍多称燕京为燕山。甚至民间说话，如《杨思温燕山遇故人》，虽产生于南宋后期，仍是这样的称呼。这里，不仅仅是一个地名的问题，实有深厚的民族情感在内。

多少年来，金代文学的研究，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。正如吴梅先生在《词学概论》中所慨叹的那样，“前为宋所掩，后为元所压，遂使豪俊无闻，学术未显，识者惜之！”期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早日填补这个缺陷。

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八月再订

【附】 《五代史平话》成书年表

公元1102—1110年（宋徽宗崇宁、大观间）：

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：“崇、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，……霍四究说《三分》，尹常卖《五代史》。”

按：此为今日所见之最早《五代史》讲史资料。

公元1126年（宋钦宗靖康元年、金太宗天会四年）：

金兵破汴京，北宋亡，金人改“京东路”为“山东路”，“信德府”为“邢州”，“尧山县”为“唐山县”，并以“邢州”改属“山东西路”。

按：今《五代史平话》周史上引郭威话本故事，称威“乃山东路邢州唐山县地名尧山人氏”，可见此话本当起于金初以后。

公元1132年（宋高宗绍兴二年、金太宗天会十年）：

浙东茶盐公使庠刊《资治通鉴》于余姚，即章钰所称之“十二行本”。

按：《五代史平话》作者当见此本。

公元1141—1148年（宋高宗绍兴、金熙宗皇统间）：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百四十三引苗耀《神麓记》：

“有说使（史）人刘敏讲演书籍，至五代梁末帝‘以诛友珪’句，充拍案厉声曰：‘有如是乎！’”

按：金宗室完颜充皇统间封代王，九年卒，见《金史》本传。此条可见金地说话人仍有讲说《五代史》者。

公元1190年（宋光宗绍熙元年、金章宗明昌元年）：

《刘知远诸宫调》当刊于此年前后。西夏刊本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刊于此年，此书与《刘知远诸宫调》清末同时发现于河西黑水城，估计二书刊刻年代相去未远。

按：今《五代史平话》汉史上叙刘知远、李三娘故事，即出自诸宫调。

公元1207年（宋宁宗开禧三年、金章宗泰和七年）：

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：“削去薛居正《五代史》，止用欧阳修所撰。”

按：今《五代史平话》不取薛史，当与此禁令有关。

公元1218年（宋宁宗嘉定十一年、金宣宗兴定二年、元太祖十三年）：

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：“十三年戊寅秋八月，……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，克太原、平阳及忻、代、泽、潞、汾、霍等州”。立太原路总管府，治太原府。

按：今《五代史平话》汉史上刘知远出身故事，已有“太原路”之地名，可见《平话》当作于此年之后。

公元1220年（宋宁宗嘉定十三年、金宣宗兴定四年、元太祖十五年）：

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：“元太祖十五，年严实以彰德、大名……等户三十万来归，以实行台东平”，置东平路，山东西路之名始废。

公元1234年（宋理宗端平元年、金末帝天兴三年、元太宗六年），

是年金亡。涵芬楼影印宋本《资治通鉴》，即章钰所云之“乙十一行本”，避“郭”、“敦”诸字，当为理宗至度宗间（1225—1274）刊本。

按：今《五代史平话》作者犹见此本，当作于金亡后不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兰州大学中文系

元好问《摸鱼儿》词未佚

《文献》1988年第2期62页补白刊登王建国同志《元好问的一首佚词》一文，言唐圭璋先生所编《全金元词》未收元好问所作的一首〔摸鱼儿〕（“恨人间，情是何物……”）词。经查，唐圭璋所编《全金元词》（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共收录三首题为元好问所作〔摸鱼儿〕词（见该书卷上7⁵⁴页），上述一词是其中的第二首，词的正文前还有一段序文。词中仅个别字句与王文所据冯梦龙《情史》所录该词有差别。如《全金元词》中该词首句为“恨人间，情是何物，……”；《情史》中该词首句为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……”其余内容无大差别。故王文中所言“该词当为元好问的佚词”当系失察所致误。

• 问 津 •